

在中国足球实现职业化改革的前期就已有雏形。早在1989年，中国足协曾提出过实体化建议，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管办分离”。“管办分离”的说法首次被正式提出则是在2004年。当年，7家中超俱乐部组成“G7联盟”，矛头直指联赛“管办不分”。2005年中超公司成立，但中国足球依然保留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管办不分”被视为中国足球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最大桎梏。足管中心这个由原来的处级单位国家体委足球处演变而来的司局级机构，扮演了“半官半民”的畸形角色：它跟足协人马班子相同，可编制上却归于总局行政序列，一把手也系任命，结果考核体系也是政绩，这导致的足球推进工作“只唯上”和职能含混之弊。

直到2015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不设行政级别。由国务院牵头对足球进行顶层设计，单项体育运动被国家提升到政策层面和战略发展决策的高度，这在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史上，也是头一回。2017年1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则正式注销，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此举也被视作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不过，6年过去了，中国职业足球的管办分离仍处于行政机构与行业协会分离的初级阶段，管办分离直到现在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中国足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少长效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除了不作为和无作为之外，更是成为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最直接因素。

“管办不分”被视为中国足球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最大桎梏。

足协作为民间性质的行业自治组织，在处理职业足球领域中的繁复问题时，总是显得捉襟见肘。

在此轮反腐行动中，作为中国足球最高管理机构的中国足协成为重灾区，先是中国男足原主帅李铁涉嫌严重违法被查，随后是中国足协原秘书长刘奕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再到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涉嫌违纪违法被查，然后是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涉嫌违纪违法被查，再到最近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竞赛部部长黄松涉嫌违法被查，中国足协内部几个重要部门几乎全部沦陷，令人瞠目结舌。

下图：2023赛季中超联赛于4月15日开幕，开幕式于当晚在改造复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十多年前的那场反赌扫黑行动依然历历在目，谢亚龙、杨一民、南勇等足协高官遭受牢狱之灾，然而中国足球并未因此变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乱象丛生。其中，“管办分离”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去行政化”之后的足球领域依然是腐败重灾区，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职业化程度而筹备的中超职业联盟，从提出至今已经11年光景，仍没有结果，至今挂着一个“筹”字。究其原因，有圈内媒体人士指出，中超职业联盟卡壳的关键，在于中国足协始终不愿意放弃手中一直握住的核心理力，也就是掌控权。那么这样一来，

